

311

1217.2
L234
3

第三卷

雷加文集

贈書

校外
雷加

北京出版社



A1016783

第三卷总目

散 文

灵堂之尊

- 彭真同志遗像前…………… (1)

往事不容空白

- “延安整风”回忆…………… (3)

- 作家书简…………… (44)

- 走向源头…………… (47)

- 大运河…………… (52)

- 大西北一角…………… (57)

- 鸭绿江…………… (65)

- 童年…………… (83)

- 五月的鲜花…………… (91)

- 在窑洞里…………… (99)

- 来自黄河口的报告…………… (110)

- 胜利油田即景…………… (120)

- “晚霞工程”的启示…………… (127)

她来自加格达奇

- 悼念邵云环烈士…………… (130)

- 我与造纸工业…………… (133)

- 手…………… (137)

风·····	(142)
震中·····	(146)
马家沟矿片断	
——地震纪事·····	(151)
八街女儿	
——地震纪事·····	(163)
洪水之夜·····	(171)
街洪·····	(176)
“百年一遇”手记·····	(182)
守候·····	(193)
过去的芦柴滩·····	(196)
柳赞·····	(204)
沙的游戏·····	(212)
火烧林·····	(217)
江河行·····	(221)
绶带·····	(229)
第一代康拜因手	
——记刘璞同志·····	(234)
渤海印象·····	(237)
马应海闹红·····	(246)
红旗压城·····	(255)

中短篇小说

一支三八式·····	(269)
水塔·····	(288)
五大洲的帽子·····	(310)
平常的故事·····	(332)
揽羊人·····	(340)

“女儿坟”最后一代

——一篇无可考证的传说	(356)
纺车又响了	(377)
路	(389)
沉默的黑怀德	(398)
麦地的梦	(411)
鱗鱼	(422)
青春的召唤	(435)
百灵鸟	(440)
施工的靈魂	(451)
我和沙娃	(465)
心的歌	(479)
灵车西行	(484)
黄河在咆哮	(493)
足迹所到的地方	(512)
三门峡工地	(526)

散文

灵堂之尊

——彭真同志遗像前

从这条胡同走去，通向一座灵堂。

这条小胡同，它隐藏在青灰色阴影里，它，又是那么安静。

它的大门和墙壁一色，像是一面无尘无垢的镜子。

大门外的人，默默站立着。他迎来每个前来吊唁的人。大门缓缓打开，似乎没有门槛。迎面是一座楼房，不大的院子，又有一个小小的花坛。花坛中有花，不，更多的是花圈。花坛和花圈似乎在争美。不，花坛的花赶不上花圈的花。花圈上的花，它们带来山野气息，仿佛直接从山西家乡黄土高原采撷下来，又由乡亲的手编成花圈，直接送到灵堂前面来了。

灵堂遗像前面的花圈更多。它被灯光照耀着，因此，这张高悬的遗像比报上刊登的那张，更多了一些笑容。

这里的一切，是那么肃穆。灵堂门前朵朵白花，戴在每个人胸襟上，他们又在签名簿上留下无限的敬仰和哀情。然后，他们在哀乐声中，向这位革命先驱和奠基人深深地三鞠躬。

这一阵阵哀乐声倾诉了这位老一代革命家的一生。他，是二十年代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又是中国共产党北方地区的领导人。在当年那些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中，多少工人群众和青年学子，跟在他的红旗下面战斗和前进。斗争烈火和亲切

召唤，溢满祖国大地。此后，他从“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走向东北大地，为实现中共“七大”作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决策，他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革命力量，扩大队伍，为建立根据地，为以后取得更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他是老一代革命伟人之一，是他带领我们收复了祖国的白山黑水，拯救了三千万东北同胞。我噙着感激的泪水，默默地注视着他的遗像。然后，我被人扶持着，沿着一条长长的走廊走了出来。

走廊很长，我感觉很长。走廊上，我没有看见什么。我没有看见什么颜色和装饰，似乎海天一色。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不，我似乎又曾看见了什么。我看见的是在那些战斗的年月里我曾见过又住过的那些简单朴实的窑洞。那一排排窑洞是那么温暖宜人，又有那么多的古代遗风和生活气息……

我又来到前院。我又看见了花坛和花坛里堆满了的花圈，同时我也看见了花坛后面那座砖楼。它的正面平淡无饰，既没有雕栏，也没有凉台。至于那层凹凸不平的红砖，恐怕也有百年的历史了。它显得那么苍老，不过它又是那么幽静，无比的幽静。

(1997年)

往事不容空白

——“延安整风”回忆

每个人都从过去的岁月中走来。
岁月陈旧了，记忆总是清新的。

上 篇

一、小 城

这是大西北的一座小小的塞外古城。

我爱着这座古城。

这里有许许多多事物，把我和这座山城系起来了。

我爱听算盘珠响，这里每个店铺都有算盘。我爱打铁炉，这里的风箱和砧声十分入耳。我在延安学会了用布条打草鞋，这里的人穿山地鞋又伴着驼铃声，显得更加幽雅。我爱老街，这里一条老街似乎比哪里都老。

这个古城，这条老街最为难忘。

老街不太长，也不太陡。它南边抵住城墙根，那里有不少深宅大院。北面是山坡，山坡上耸立着最高学府绥德师范中

学，学校旁边的山尖上是那座有名的扶苏^①祠。扶苏祠前有一块小小坡地，坡地上是一片疏疏落落的灌木林。

西南角是古城的水门。有摩崖石刻，有古栈道，有一条清清的小理河绕城而过。到了夏天，全城妇女穿上百褶裙和木底鞋，来到溪边洗濯。这里变成一片花海，又是一片嬉笑声。隔河高大的蒙恬^②墓，这时也开颜而笑了。墓上少得可怜的青草，随着笑声一波一波地荡漾着。这是夏天一度不可多得的景观。

至于冬天，因为这里多的是煤炭，每家每户都是暖烘烘的。到了元宵节这一天，在那条老街的十字路口，用大块煤炭架起一堆篝火。足有两丈多高，把一轮圆月托得又高又远，又是那么朦朦胧胧的。青石板路像是一条地火龙，全城湮没在温暖欢乐之中。

我来这里正赶上一个元宵节。

这座古城叫绥德，走出城门一条大川直达米脂。“米脂的婆姨绥德汉”，指的就是这里。

我又是怎样由延安来到这里的呢？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1942年3月，我和魏伯、庄启东三家人由延安搬到绥德来了。延安离绥德300里，足足走了三天。

庄启东是左联老战士，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办《春光》杂志，发表了艾青的第一首诗。魏伯是“一二·九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抗战后在河南家乡打游击，继又参加第二战区文工团。当时我们三人都在延安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

① 扶苏，秦始皇之子。公元前210年与大将蒙恬于此同为秦二世所杀。

② 蒙恬，自祖父起世代为秦名将，秦并天下后，率三十万大军守边并筑长城。据说死后将士们含泪用武器掘土堆起此墓。

内集聚了不少全国知名的文化界人士。“文抗”和延安任何机关一样，因战事原因有聚有散，又常聚常散。比如“文抗”先后派出抗战文艺工作团三组人马，奔赴各抗日前线。也有人常常随着剧团下乡。人不断来来往往，像流动的兵营，不过那都是短时期的。这次，我同魏伯、庄启东都是正式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出介绍信，长期到绥德一带下乡体验生活的。不久，柳青和师陀也来了。

绥德警备区是陕甘宁边区北面一个专区，直辖好几个县，地委书记习仲勋，专员曹力如，司令员是王震将军。它北面对着榆林这个国民党的据点，东边黄河对岸常常传来抗战的炮声。这时警备区正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我们这些人参加工作队，走遍了米脂、吴堡各县。

米脂、吴堡流传着那么多刘志丹和谢子长的传说。几乎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闹红”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像是一篇神话。神话的产生莫不如此。一旦梦想达到了，把喜悦之情全部寄托在英雄人物身上。今天为了抗日这个口号，在这里成立了“三三制”政权，实行“二五减租”。几个有名的财主村子依然存在，米脂县政权因面对榆林也只以县务委员会形式出现。不久，魏伯担任了米脂县务委员一职，庄启东也去米脂县最大的财主村子杨家沟任副区长。这时张闻天同志也在杨家沟做调查研究工作。我和庄启东为了深入基层，不久又双双调到绥德县义合镇两个乡做乡文书工作。

我所在的乡叫党家沟，乡长李树祥是一个土地革命时期的老干部。因党组织尚未公开，一切活动都在夜间（地下）进行。我和李树祥爬遍了那条沟的嶮嶮畔畔，有时会惹得狗叫连天。开会的地点是秘密的，还在窗上蒙上一层被子，为的不走漏一丝风声。

我在中农赵家吃派饭，正是割麦时节，他的几个儿子都是

好劳力，中午送饭到地头上，晚上回来常常是一大盆土豆茄子熬倭瓜。听说每房媳妇每年分一些棉花，自纺自织。农忙时夫妇不得同房，吃罢晚饭，老爷子就喊：“快休息咯，明天还要起早。”

党家沟在一条小岔沟里，离区政府义合镇十几里路。义合镇是直达黄河柳林的大镇，区长叫丁汾，是延安“女大”派下来的妇女工作团成员，她就任伊始分发县府送来的公章，一大堆公章很好看，她竟爱不释手捏住一个说：“这个好看，区政府就要这个吧！”惹得大家大笑，笑她忘记了公章早刻好了各乡的名字，它是挑不得的。

区政府原是一个寺观建筑，它高居陡崖之上，门前那几十层青砖台阶十分壮观。那年春旱，乡长李树祥正准备带领一支祈雨乡民，在区政府前面广场上大做法场。乡干部到县上开会，都是先在区政府门口集合，再走四十里路进城。

这一次，又叫乡干部进城开会了。

二、七千人和一个

这一次会，不比从前，开了个七千人的大会^①。

上一次开什么会，我已忘记了。只记得正在发夏衣。这两年的军装都是由国民党那里给八路军发下来的。一年比一年差，棉绒粗得像麻袋，裤子也变成中国式的大裆裤。我曾试着把大裆裤改成西式裤，因要改装还需换一条更大号的裤子。在边区打草鞋和纺线已不算什么稀奇，但还很少有人把中式裤子改成西式裤的。

这次七千人大会，由各乡各镇来了不少人。

^① 此事应是在1943年。“抢救运动”发生在1943年4、5月，7月是高峰。

露天会场设在扶苏祠的山坡上，最为理想。因为扶苏祠前有一块漫坡地，其中还有不多的树木，除此之外在这城里再也找不出可以搭一个大台子和容纳七千人的地方了。

头一次开这么大的会，谁都觉得新鲜。临时搭成的主席台，大幅的横标，还有黑压压的人群。我坐在群众中间，心里想：这可能是反奸大会，又像是审判大会。因为前些日子早已传来延安开始整风，又搞什么抢救运动。怕是一阵风刮到绥德来了。但我又觉得这一切与我无关。纵然是暴风骤雨，我坐在大树底下又怕什么。忽然口号声乍起：“押上来！”“押上来！”我又听见喊我的名字。不容我想为什么喊我的名字，我的膀臂已被揪住，又拖我向主席台走去。几个人在后边挟持着，拥簇着，我的两条腿又像失去了知觉，跟着他们挤过人群中的甬道，向前走去。这时我两目茫然，什么也看不见。群众呼声中夹杂着“汉奸”、“特务”等字眼。这些字眼，我使用过，是我向那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彘们掷去过，现在由群众口中向我身上投来了，它像一颗颗重炮弹，在我身旁造成漩涡。我向下沉去，又在本能地向上挣扎。头脑发木，似乎又十分清醒。在这走向主席台的刹那间，我在心里又抗议，又辩解：“我怎么会呢？我怎么可能呢？”在我一生中，有多少经历可以证明我绝对不是。我生在鸭绿江边，隔岸就是亡国的朝鲜。我生下来就知道南满车站是日租界。我在二道桥子抵制日货。“九·一八”那天日本兵闯进了我在沈阳的学校，搜查时学生们在机关枪下呆了六个钟头。学校进关，“一·二八”组成抗日义勇军，我又奔向上海浏河口前线。“七七事变”之后，我又来到延安，又去过冀中军区前线……在这一代青年中间，不是大家都走着这条正义、光荣的路吗？

我不知道我怎样走上主席台的。现在，我站在台上，面对着广大群众，我说什么呢？群众提出了那么严重的问题，显然

需要回答，但我又怎样回答呢？最简便了当的办法，我声明我不是，但群众一定不满意，又会挑剔我态度不好，再掷来一顶“对抗组织、反对群众”的帽子。我站在台上只觉得时间似乎停止了，心脏也似乎不再跳动了。我张开嘴要喊什么又未能喊出来，我这个人似乎也不存在了。但我又意识到台下七千个群众都在盯视着我，又在等待我的回答。我不觉得这是耻辱，只觉得这是无以名状的委屈。它又刻不容缓，我急得像溺水中喘最后一口气，喘不上这口气我就会死去。毕竟——毕竟我喊出来了。我仅仅喊出了五个字。这五个字冲口而出，像枪弹一样，它似乎没有经过头脑，也没有经过任何斟酌，但它又那么切中命题，它又那么合乎我的心意。这五个字是“打一回一老一家一去！”这五个字一定伴着什么手势。但是什么手势，我想不起来了，也来不及想了。这五个字它是这样有力量。在过去游行队伍中，我无数次举起拳头喊过它。它本身就是一句极其响亮的抗战口号。它是抗战中间最动人心弦的一句口号，它又是只有东北人才会如此动情喊出来的一句口号。这五个字，此时对我来说，它的潜台词意义十分重大，它是：我是东北人，怎会当汉奸呢？今天全民抗战，东北人又怎么会是特务呢？东北人又怎么是反革命呢？

这当然是我对七千人大会最好的回答。我当时为了找到这五个字，感到最大的满足。

但是对于那天七千人的大会，除了这五个字，一切我都忘记了，一切都模糊了，一切我都想不起来了。

那一天我的爱人伊苇也参加了大会，她的震惊比我大还是小，我无从知道。只是那一天她在台下全都看见了，同时她也看见了我看不到的，她听见了我没听到的。她后来告诉我在一片喊声中，“枪毙雷加！”“枪毙雷加！”这句话最为可怕，也最为响亮，何况那又是由几个熟人喊出来的。当场揭发问题的

人，倒也有几个，只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居然一位女同志提出尖厉的质问：“问问雷加，他为什么和别人换裤子？”这是指我改做大裆裤子那件事。如果这位女同志再当场挥舞着我那条裤子纠缠下去，那倒可能闹出大笑话了。

至于后来如何散会，又如何把我押进一间空空荡荡的大窑洞，我像一个失去记忆的人，什么也不记得了。那天主席台上对我来说无疑是晴天一个霹雳，我的神经震得麻木了，顿时失去了自我。我对我自己什么也不存在了。群众已经不承认我的过去，另一方面我又无法接受群众提出来的我的那个“未来”。我失去了一切空间和时间。我也不知道现在我在哪里，将来又在哪儿。仿佛我蒙着眼睛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又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是一只疲倦的猫，连我刻着时间亮度的眼睛也闭上了。真是这样吗？我的灵魂深处又叫着：我该是一个强者。这一夜我醒着又像是做梦，梦中又像是醒着。

天麻麻亮，窗外响起一片喊声。当时我不知我在哪里，我又不知窗外发生了什么事。我的窑门一下子推开了，又重重地关上了。一个声音在说：“还好，他没有跑？”接着是邻窑的开锁声，邻窑有人敲打窑门同时在喊：“开门，开门！锁我干什么？”我一听知道这是我爱人的声音。锁子开了，她走出来又在质问：“我不是犯人，为什么锁我？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时我猜到这是锁错了门，应该锁我这个门却锁了她的门。但是她又是怎么住在邻窑的呢？我再一看这是一排办公窑洞。我是临时寄押在这里的，我的爱人也因刚从乡下来，也只好临时寄住在这里。因为两个窑洞紧挨着，所以一时锁错了。这是一场误会。其实误会也没关系。虽然，该锁的没有锁，可是人没有逃跑，不该锁的虽然锁了一夜，这也是白锁，她并未因此戴上一顶什么帽子。

这个误会其实不大，却耐人寻味。如果看管犯人的人怕我们两人夜间幽会，他也是够聪明的，也做到家了。真的只有一把锁就够了，不论锁在哪个门上，反正有一扇门相隔，两个人见不了面也就幽会不成了。

不过这把锁也表示了我与妻子的隔离，与全世界的隔离。我当做犯人被关在城外一个叫白家沟的监狱里了。与外界根本音信不通了。

三、和“死号”在一起

此后几个月，我过的是罪犯的生活。

凡是罪犯都得有供认不讳的犯罪条款。我什么也没有，心里敞敞亮亮，甚至我想不出来故意踩死过蚂蚁。但是一喊我的番号提审一次，或者叫我写一次交待材料，我又意识到我是一个该死的“罪犯”了。

白家沟其实不能叫做沟，因为它没有后沟可言，是一条死沟。只能算是一个山窝，本地人叫山瓜瓜，但它又不够宽大。既是一个山瓜瓜，周围挖上窑洞，后山坡又高高的，没有一个出口，只要在四周高坡上修上几个岗楼，犯人想逃也是插翅难飞的。

凡是犯人，都是先编号后剃头。说起剃头，大概是第二天下午的事，太阳照在山坡上暖暖的，摆上一只木凳子，然后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坐下。我没有看给我理发的人，他似乎也没有看我。我的长头发早该理了，想不到这里这么周到，第二天就会轮到我。我只觉得有五根手指按在我的头上，于是一簇头发落在我的脚前。我的头上像是开出了一条壕沟，一阵冷风就从这里一直灌进我的灵魂。这时，我再也不能不承认我有小资产阶级意识了，它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全暴露出来了。这时，

我倒是想反抗，想提出抗议，我想向一切人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利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的头发剪下来。但是我又一动未动，我呆住了。我也知道反抗是无用的，剪与不剪这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权利的斗争。我不能加以任何反抗，这就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罪犯了。

我的秃头使我变成了真正的罪犯，我又在秃头上戴上了一顶有罪犯标志的帽子。那是一条白毛巾，因为我不得不用毛巾把秃头包起来。毛巾包头在西北一带大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毛巾蒙在头上，在后脑勺把毛巾两角系起来。我不喜欢这一种。在延安和陕北不是这样的，他们把毛巾先兜在后脑勺上，然后再在脑门前面打个结。这样，毛巾的两角朝前翘起，像是羊的两只角，煞是好看。我喜欢这一种。此后我头上始终包着这块羊角式的毛巾了。这也表明我是一名真正的罪犯了。

我和一个抢劫强奸犯关在一起。他也刚剃过头。我的头像白果，他的头像是青皮萝卜。他的头顶又尖些，脖子也长些，一只大喉核又不住地上下滚动。我们的窑洞是一个小土窑，比大路两边的避雨窑大不了多少。窑里又是半铺小炕，我和他就紧挨着睡在这铺小炕上。我们俩不大讲话，又谁也不瞧谁，但又不放过对方的每个动作和每个眼神。我同他都认为自己是精于世故的人了，不要多久，似乎互相都了解个差不离了。

这个犯人的名字我没问过，这又表现出我这个知识分子的清高来了。他不大讲话，对自己案情讳莫如深，但对自己的桃色事件却津津乐道，有如日常的吃吃喝喝那样：有一次，他打短工的时候，那是冬天，主家不在家，婆姨搂着孩子，睡在暖炕上。他半夜起来给牲口拌料，拌了料又从暖炕过，他从后身揭开被子一下子溜进婆姨的被窝里了。不用说两个人都精光光的，谁也不觉得惊奇，婆姨也不觉得什么，只是骂了一句：“我早就知道你这个死脑壳会……”这种例子对他来说也许还

多，但是关于暴力行为他一句不说。

他平常寡言少语，动作起来也许比我还要斯文。我们俩有一个共同嗜好，那就是吸叶子烟，这也是我和他相处之间惟一亲密的关系。

我们只有一点点黄烟叶子碎末，它撒在炕边上和黄土混在一起，谁也看不出来。至于烟具一无所有，既没有烟锅，也没有卷烟的纸片。但我们又可以随时随地吸起烟来，也就是说可以随时随地吞云吐雾过过瘾。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神奇的吸烟工具，这神奇的工具应该说是他的专利发明。我真的没有想到世界上有这种吸烟的方法。后来，多少年我再也没有这样吸过烟。具体说，它有烟锅，又不像烟锅，它有烟杆又不像烟杆。它拿不起来，又无法搬动，但用起来又十分方便。它摆在面前，查监的看不出来，又拿不走。这个吸烟工具真是天下少有，神奇极了。

原来，我们那半个土炕，炕沿是一幅青砖砌成的，其中有一块青砖就是我们共用的烟锅。这块青砖利用它的对角两个侧面，上下挖成两个小洞，并使这两个小洞相通。如此，在上面那个洞里填上烟末，不要忘记用嘴按在下面那个小洞上面，一面点火一面吸气，于是一缕香烟便吸进肚里去了。

我们两个人一天之中，必有几次轮流放哨，又轮流吸烟。不需言语，也不需手势，两个人都在心领意会轮流过瘾。在这一点上，我们两个人又变成真正的难友了。

炕沿那么长，又那么大。烟锅的小孔，又是那么小，又不是一条线上。一条炕沿，一支烟锅。我不这样写，读者恐怕不会相信。我没有这样做以前，我也不会相信的。

我们每天的生活，除了吃饭吸烟之外，就是各人靠在各人的行李卷上，或睁着眼睛或闭着眼睛沉思默想了。他是“死号”，无人过问，而我到了晚上才是我每天的开始。因为我常

常被提审，又都老在晚上。我的行李卷，极其简单，只是一条薄被，一卷衣服代替枕头用，还有一条麻绳。晚饭过后，我就靠在行李卷上，瞅着那盏麻油灯，两只耳朵支起来，单等喊叫我的名字。一听见喊声，我必须很快地用麻绳把行李捆好，再扛着它走出窑洞，窑洞口早有一个荷枪的战士在等待我。他让我走在前边，他跟在我的后面，两个人向黑暗中走去。

出了窑洞一开始走下坡路，下坡路越黑越不好走。然后走出监狱大门，再走进古城的水门。水门白天是个闹市。现在晚上没有几个人，几盏街灯把带着水迹的青石板路照得乌黑发亮。照例还有几家卖碗陀的和卖油弦的，或者还有卖驴肉和熏鸡的。这条路已经走过几回了，每一回心情都不一样，这要以上次提审的过程和结果而定。每一回我都到同一个地方去，这里是绥德地委大院。每一回还都是把我带到宣传部长的窑洞里。地委大院我常去，这里是我以前汇报工作的地方，听报告的地方。这个大院人们进进出出，有黑板报，有宣传栏。1945年8月15日朱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大布告，我就是在这里看到的。我的顶头上司是宣传部长，他叫李华生，听说他在白区领导共青团工作。自然年轻，但也比我大不少。他的模样文绉绉的，如果他换上一件长衫，那就像是学生领袖。他的形象使我想起在北平我的接头人江陵，我们称江陵为牛鼻子老道。这两个人怎么这么相像，不论身材、动作、说话的节奏，或是躲在镜片后面的目光。不过不同的是江陵是我的启蒙者，富于爱护和教导，他又是带头人，不论在虎头崖、南京、武汉，他都指示我的工作，并加以照顾。现在这个李华生却是站在我的对立面，向我提出各种疑问，又常常是不满足的样子。看来，过去我的工作由他领导，现在我的案子也由他来审理了。

他住在一间大窑洞里。窑洞门窗都开在窑洞前部，办公桌